

12月12日,晴,南京万里无云。这座城市已经为国家公祭日做好了准备。对于南京人来说,12月13日是一个十足特殊的日子——它曾经是个伤疤,一不小心碰到,就会痛彻心扉,痛入骨髓。

从战争废墟上站起的人们,有资格挺起腰板,昂起头颅,以胜利者的名义告慰亡灵。

战争中,我们是胜利者,曾以简陋的武器击败穷凶极恶的敌人。

历史上,我们是胜利者,曾代表正义审判邪恶。

精神上,我们是胜利者,我们还活着,并将这段历史传播给更多人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鹿伟 王颖菲 贾磊 见习记者 邓月

不忘历史,犹记得大街上的欢呼 昂起头颅,以胜利者的名义抚慰亡灵

12月11日上午,伍秀英坐在家中的椅子上,眼神里满是沧桑。当电视中开始播放某抗日电视剧时,她突然有点坐卧不安。

胜利者的感觉 越发强烈
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
伍秀英 84岁

看到电视剧里的鬼子 就想起难民营的日子

虹苑新寓位于南京城西,靠近满是高楼大厦的河西和车水马龙的应天大街高架桥,却是一处极安静的老小区。

老小区里老人多,大家喜欢聚在一起聊天,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伍秀英的大屠杀幸存者身份。她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老人那样,喜欢看电视剧,时不时操心下儿女的工作和生活,儿孙满堂。

只有在看到电视剧里的鬼子时,84岁的伍秀英才有点坐卧不安,不同于当年轻人对“抗日神剧”的口诛笔伐,老人觉得这些电视剧都很真实。

“他们就是这样,穿着黄军装,挎着刀,看人时总是眯着眼,一言不合就抽出刀来。”伍秀英说。

1937年12月13日,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时,伍秀英只依稀记得一些情况。“先是听见大炮声,又有人说日本人进城了,我父母带着我跑到了五台山的难民营。”

日军进城的消息传到太平北路附近时,伍秀英的父亲,一位有着一间店面的木匠决定带着家人逃跑,他收拾了为数不多的财产,带着妻子和女儿伍秀英,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逃出门。

他有些懊恼,因为他联系不到出门在外的大儿子——实际上,在日军进攻上海时,他的大儿子就参军去了上海。此后音信全无。

街上的人很多,哭喊声、怒骂声让涌动的人潮更加拥挤了,许多人聚集到了位于五台山附近的一处难民营,伍秀英一家就在其中,“经常有日本兵到难民区来骚扰,他们在里面不敢杀人,却经常举刀吓唬人。难民营里吃的不多,我们需要带着钱出去买食物,我父亲有一次出去,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,原来,他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了。”

“难民营里也有一帮人教小孩读书,他们推着小黑板,我就是跟他们学的认字。”这些跟恐惧有关的记忆,伴随了伍秀英一年多,1939年左右,南京稳定了些,他们一家人才从难民营出来,摆脱了难民身份。



伍秀英在讲述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那一天,大街上有人欢呼“胜利了”

“我们出来时,家已经没了,被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。”伍秀英回忆说,当时,南京城里人少得可怜,许多高宅大院大门敞着,里面空空荡荡,她父亲带着一家人住进了其中一个院子,但很快,就被日本军人赶了出来,“后来,那个院子成了日军的妓院。”回到太平北路附近,伍秀英的父亲又搭起了一个小小的铺面,前面帮人箍桶,后面住人。年幼的伍秀英需要照顾更加幼小的妹妹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。

“当时的太平路上,日本人特别多,不是日本兵,是开洋行的日本人。”伍秀英说,这些日本侨民穿着宽大的和服,走起路来趾高气扬。许多像伍秀英父亲一样的中国人也居住在这条街上,走路时往往低着头,从事的也大多数是拉洋车、卖早餐之类的工作。

伍秀英见识了日本兵的跋扈,“有个日本兵穿着黄军装,坐完黄包车后,不打算给钱,拉车的想理论几句,他马上把刀抽出来,举过了头顶。”

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。大街上有人欢呼“胜利了”。

她看到昔日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开始撤离,“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,背着大包小包,从太平北路往北走,一个个都低着头,一句话都不说。”伍秀英说,与之相对的,是衣衫褴褛的中国人,他们依然面带菜色,工作卑微,却昂起了头,有些人甚至大着胆子,朝日本人大声怒骂。

伍秀英成了胜利者之一,这种感觉,近年来越发强烈。

“这些年,国家越来越重视这段历史了。”伍秀英说,前几年,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时任馆长朱成山找到了她,采集了她的证言,给她带来了身份证明,她可以凭借这个证明领取补助,报销医药费。去年国家公祭日时,政府曾经邀请伍秀英到现场观看,她因为腿脚不太方便没去,“但后来在电视上看了,特别自豪。”伍秀英说。今年她仍然去不了现场,但她会看着电视里的公祭仪式,一起告慰亡灵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一晃70年过去了,当年的年轻人已成了耄耋老人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岑洪桂就是其中一位,老人今年91岁。在他的脑海中,70年前那个夏天的记忆却异常清晰。

特别想把胜利的消息 告诉遇难的弟弟
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岑洪桂 91岁



岑洪桂获赠《南京大屠杀辞典》 现代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得知抗战胜利消息,大家都拍手叫好

听到胜利消息的那一刻,岑洪桂老人想到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的弟弟,“特别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,让他安息”。“当时我在南京打工,是我的一个军人老乡告诉我这个消息的。”一提起当年的场景,今年91岁的岑洪桂老人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,“大家都拍手叫好,非常兴奋。”

对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痛苦经历,岑洪桂老人仍记忆犹新:1930年,岑洪桂的父亲岑秀楼、母亲岑岑氏带着他和二妹岑洪兰、二弟岑洪振和三弟,从苏北老家邳县逃荒来到南京,住在南京汉中门外北化厂街城墙边,靠做苦力为生。

“1937年12月,日军火烧汉中门外城根根的稻草房,父母带着我和二妹、二弟逃出火海。当时,未满两岁的三弟岑小三在屋内睡觉,因日军阻止父母返回屋内,三弟被活活烧死……”说到这里,岑洪桂老人沉默不语,眼含泪花。

他当年则被日军士兵推入火海,腿被烧伤。岑洪桂老人一边说着,一边激动地撩起裤腿,告诉记者现在腿上还有烧伤的疤痕。

“当年的经历想起来就非常痛苦,我们胜利的那一刻应该被记住。”岑洪桂老人感慨地说,没有当年的胜利,就不会有现在的和平以及幸福的生活。

今年再次参加国家公祭仪式

“国家举行公祭仪式,我们盼了好多年,这是对死难亲人、同胞最好的慰藉。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,让更多的人知道并记住这段历史。”2013年12月,岑洪桂老人曾前往日本熊本、长崎、福冈等地,参加在当地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会,以其亲身经历讲述了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,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到历史的真相,有力回击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。

如今,老人家里四世同堂,他时常会给儿孙们讲起当年的经历,“告诉他们不能忘本呀,要让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”。只要儿孙们有时间,他还会带着他们去参加江东门纪念馆举行的家庭祭告活动。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,岑洪桂老人去年参加了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,成为了公祭仪式上的主角之一。今天,他还将参加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。